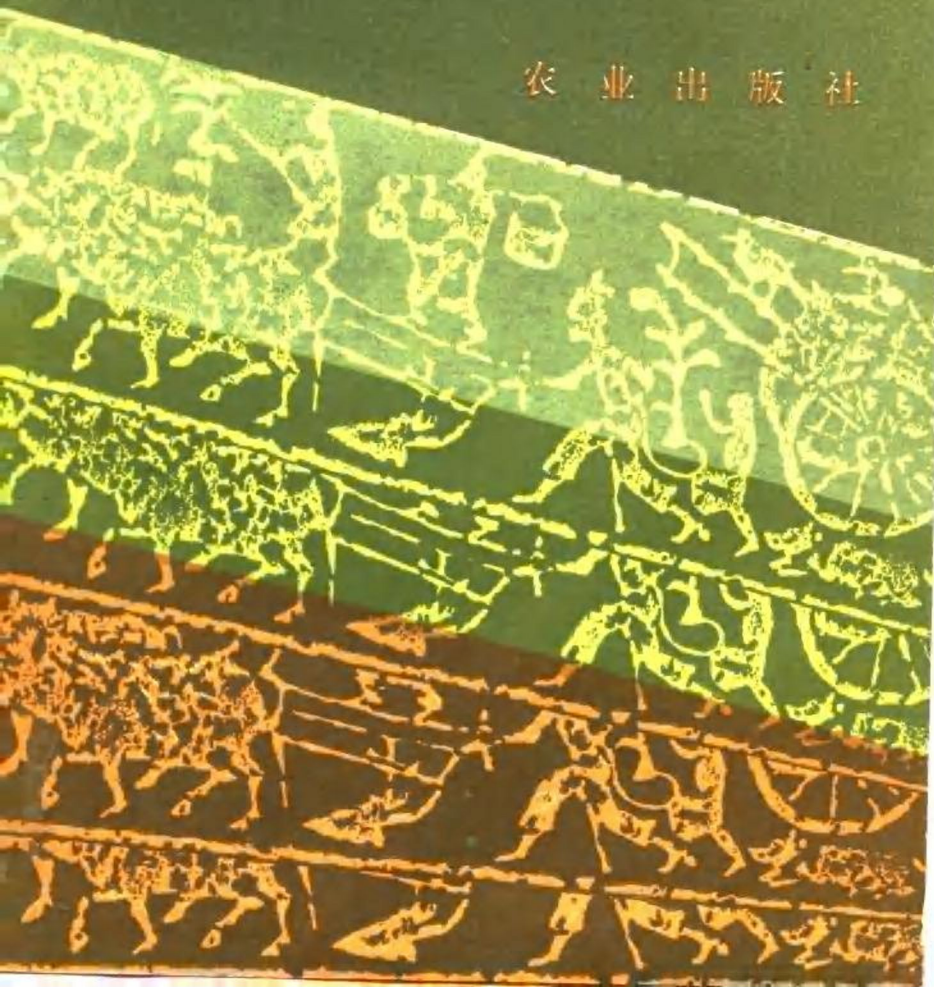


唐代江南農業的發展

李伯重 著

農業出版社



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

李伯重 著

农业出版社

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

李伯重 著

• • •
责任编辑 段晓东

农业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区枣营路）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通县向阳印刷厂印刷

787×1092mm32开本 11印张 228千字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885册 定价6.80元

ISBN 7-109-01589-0/S·1064

序

韩国磐

凡人之学问，或来自工作实践，或来自实验，或来自读书。自实践而来者真且确，但以一人之身，何能事事皆从实践中来，故由此得之者盖有限。自实验来者亦自可贵，但事有不可实验者，如过去之历史，重演尚不可能，何况乎见诸实验！唯有图书，总结诸事诸物之经验成果，凡有志向学者，均可从中汲取知识，历观古今中外兴亡成败之迹，驾驭山川水陆声光电热之方，胥可取之于斯。故每个人之学问，直接来自实践实验者，费力费时而难且少，间接得之于图书者，则较简易而居多。如学习历史科学者，固可由考古文物、实地调查，掌握若干真事实物，然大半以上则得之于传世文献。抑且苟无文献所载年代知识，纵得商彝周鼎，秦砖汉瓦，亦不知其为何时物，是得宝而不识宝，亦奚能为！然则书不可不读，乃一定不易之理，亦举世之公论也。

唯读书亦有方。处于今之世，汗牛充栋，已不足以喻书之多。一人竭尽毕生之力，于书山学海之中，所能习而得之者，真沧海之一粟。因此，既须勤于读，更须善于读。不善读者，如古之时，有白首而老于场屋，犹为童生。善读者，未至弱冠，已为状元，而历位卿相。然善读者，又非一途，不同之学科则有不同之方法。概而言之，钩玄提要，含英咀华，推陈出新，取精用宏，似亦庶几其可矣。

博士李君伯重，十年前就学于厦门大学，从余攻读硕士研究生时，探讨唐代长江中下游个体农民生产之发展，遍读唐代古史诗文以及有关著作，既能总其纲要，又能深入解剖，条分缕析，时出新意，固已崭露头角，迥出流辈，为师友所称道。其后转而攻读明清经济史，取得博士学位。后又曾至美国讲学。接触中外学者益多，阅历益增，学识日益精进。于是，就昔日研究唐代长江中下游个体农民经济之基础上，参阅中外有关著作，撰成《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一书，其中论述益精，创见益多，李君真勤于读书，善于读书，为当今青年史学家中之佼佼者，此书即其成绩卓著之效也。

或曰：读书著书，不过见之于空言，其于世也何补？曰：读书所得，固为间接经验，而间接经验本亦来自实践，吾人可以检验其是否合乎时地之宜，合则再行之，不合则修改而使之合，否则摒弃之，庶几有所选择而不至于茫然无所适从。至于史书，总结前代经验，以为龟鉴，尤为可贵而不能舍弃者。曹操下屯田之令曰：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是以秦汉为借鉴，而收屯田之效者。如今实行农业现代化，固然古今时移事异，然在水利、农具、劳力、耕牛、栽培技术等诸多方面，不犹有类似者在乎？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则李君关于唐代江南农业生产之著作，其亦有可以为今日之借鉴者乎！

然则书籍所载本非空言，李君此书亦非空言，皆有助于实践者。实践非藉图书无以传世，图书正所以传播实践经验于时空间者。余既欣然于李君新著之问世，亦因以志余之枵触云尔。

己巳之年仲春之月韩国磐志于鼓浪屿之老榕书屋。

序

胡 道 静

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多民族的国家，各个地区在同一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由于自然条件、人文因素和政治环境等种种原因，呈现的形态是不平衡的。基于这种不平衡，做历史研究就必需进行区域史或地区史的专门探索。经济史是如此，其他专业史也是如此，但经济史特别如此，特别显著。不言而喻，经济活动是人类各种活动的基础。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中，我国是个农业国，农业经济无疑是历史上经济活动的主要成份。正是因为同一时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缘故，所以研究我国经济史的重点任务，落到了地区农业发展的研究课题上。中国农业史、也应当说是中国史上的一个重大关键问题，是我国历史上农业生产力的强大发展在八世纪初年以后由北转南、由黄河流域转到长江下游地区的那幅壮阔的历史图象。李伯重同志捉住了这个重大课题，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与研究后写成的这本《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在历史学、特别是经济史研究上所作出的特殊贡献，是令人刮目相看的。

中国农业的上述重大变化在唐代出现以后，就铸成了江南农业生产左右全国财赋、军粮的局面，所以在宋代有“苏、常熟，天下足”之语，明代则有“苏、松财赋半天下”之说。

也正是由于忧虑这种江南负担太过沉重以及漕运困厄及弊端的形势，明代中期以后的徐贞明、徐光启等就提倡并实验在北方兴修水利、引种水稻，而清代更在河北地区大规模地实践了水稻栽种的推广，但那唐代以来形成的格局终于不能扭转。这幅长卷历史图象的关键是在于唐代，而过去学术界判断偏迟了一些。伯重同志综合运用了经济学方法、自然科学方法、比较研究方法及考据学方法，宣告“江南农业划时代的进步始于唐代”，这对于历史发展的时间计量上的尺度标准，是非常重要的。伯重同志在研索的过程中，为了更好地把握住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特征，更准确地评判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水平，把唐代江南农业放在一个较大的时、空范围中进行考察；从而才能够得到上述的结论。这本著作进行了时间的纵向比较研究与地区的横向比较研究。前者把唐代江南农业与六朝、明清江南农业作比较，从而既看到唐代的发展，又看到唐代发展的局限。后者则把唐代江南农业与唐代中原农业作比较，证明了江南农业进入唐代后，发展水平才赶上和超过中原。科学的论证，使人信服。

本书对于江南的牛耕、稻种、桑树种植、稻麦复种制、稻桑苎麻亩产量以及两税法下的赋税负担等问题，都提出了新见。在对六朝与唐代江南农业发展水平的总体评价方面，见解也与农史界和经济史界的一般看法有很大不同。这些经过艰苦搜集与探索所得到的创见，应当受到大家的重视。

伯重同志是韩国磐教授的高足，他早年的硕士论文《唐代长江中下游农民个体生产的发展》，就是在韩老指导之下写成的。韩老是我们十分尊重的隋唐五代史大师，伯重同志受其启迪，能有超优成就，盖非偶然。下面讲一件题外之事：我对于印刷发明史，素来很关心。印刷术最早发明于我

国，但究竟起源于什么时代呢？隋代之说有争议，很多人不相信，理由是现在能掌握的印刷品实物证据，是从敦煌石窟发现的公元868年（唐咸通九年）所印《金刚经》残卷，刻印时间已近唐末。韩先生的《隋唐五代史纲》则明确提出：“将雕板印刷的开始定于六世纪末或隋唐之际，绝非凿空臆说。自然还待实物为证”（韩著《隋唐五代史纲》第469页）。这种提法表明了一位博稽史实、睿思敏感的老史学家的果断与预见。接着，日本发现其称德女皇时代（公元770年左右）十万木塔中的雕印经卷《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把实物证据的时间推前了一百年左右。后来，1966年10月在南朝鲜庆州的佛国寺石塔内又发现了更早的雕印经卷（亦为《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刻印时间当在公元704—751年之间（约当我国唐代武则天时期），比日本发现的实物更早约半个世纪，已很接近韩先生所提出的年代了。南朝鲜的发现正值我国“十年动乱”的开始时期，所以这一轰动世界的文化重大发现在我国竟毫无所闻，我本人被监禁在牢狱内，更是一无所知。一直到八十年代起始时，我最初从国外文献中了解到这个已被公认而成为“旧闻”的重大发现时，大为惊讶：庆州发现本身的重大意义尚属第二位，最可惊的就是实物确证了韩先生的“绝非凿空”之说。1846年，勒维烈计算出了太阳系有未知的第八颗行星的存在，后来果然得到伽勒从天文望远镜的观测中证实。二十多年后，门捷列夫以其元素周期律的严整性为依据而进行演绎，预言了十几种未知元素的存在及其性质，亦一一为尔后的化学家所证实。伟大的科学预见，同样可以在历史学中产生而得到倒转时代的考古发现所证实。我用拙劣之笔唠叨这些，无非是想用我亲身的某些感受来说明本可以“名师必出高徒”这句利索语言所表达的意

思，如今只好忙不迭地抱歉自己之低能了。

1989年7月18日凌晨写竟

目 录

韩国馨序

胡道静序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本书题解.....	1
第二节 本书所用研究方法特点.....	6
第三节 若干说明.....	9
第二章 发展的背景.....	21
第一节 生态环境.....	22
第二节 历史起点.....	33
第三节 社会条件.....	55
第三章 生产技术的进步.....	71
第一节 水利、农具、牛耕及其他.....	73
第二节 栽培技术与饲养技术.....	98
第三节 种植制度.....	105
第四章 集约化水稻农业的形成.....	126
第一节 单位稻田劳动与资本投入的增加.....	129
第二节 单位稻田产出的增加.....	141
第三节 农户耕田数的减少.....	149
第五章 农村副业的成长.....	158
第一节 副业生产的普遍化.....	159
第二节 副业生产中集约化、专业化与商业 化倾向的出现.....	174

第六章 农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187
第一节 农民年劳动日数的增加	190
第二节 农户年生产总值的增加	209
第三节 农户年净产值的增加	225
第七章 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水平	247
第一节 与唐代中原农业的比较	248
第二节 与明清江南农业的比较	268
第八章 余论	276
第一节 唐代江南农业发展与国家统一	276
第二节 唐代江南农业发展与税制改革	285
附录	294
一 略论均田令中农民受田标准的依据	294
二 略论均田令中的“桑田二十亩”与“课种 桑五十根”	308
三 略论唐代的“日绢三尺”	320
后记	337

第一章 导 论

当我们把本书奉献给读者的时候，我们觉得首先应当向读者简略地介绍一下本书的研究对象和所用研究方法的特点。其次，鉴于本书是一部经济史著作，不能不涉及诸如度量衡、亩积、匹端制、比价及其折算等许多技术性问题。把这些问题集中起来进行说明，无疑会更方便读者阅读本书以下各章。上述几个方面，便是本章的讨论内容。

第一节 本书题解

本书的主旨，是研究唐代江南地区农业发展的状况，以及发展的背景和历史意义。

很明显，这项研究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时间——唐代；（二）地点——江南；（三）对象——农业；（四）着眼点——发展。

为什么要进行这项研究？换言之，这个研究的主题在中国农业经济史上具有何种意义？下面我们通过题解的方式予以简要说明。

（一）在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史上，唐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中国封建经济在许多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在唐代以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导致封建社会经济出现一系列有别于唐代以前的新特点。中外史

家对发生在唐代的这些重要变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肯定了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由前期阶段向后期阶段过渡的转折时期。由于唐代在中国封建经济史上的这种里程碑式的重要地位，因此对唐代的研究便有着特别的意义。通过这种研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前后两大阶段的特点，进而深入探求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的历史运动的规律。

在中国传统农业的发展史上，唐代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一些中外史家认为中国传统农业（特别是南方农业）在宋代出现了历史性的进步，甚至发生了“农业革命”。这种看法颇可商榷。姑且不论“农业革命”一词使用得当与否，我们所看到的宋代南方农业的进步，事实上大多在唐代已发生。天野元之助先生强调：长江流域水稻集约生产技术体系确定于唐代，故唐代与宋代构成中国农业史上第三个迅速发展的时期，即“华中水稻生产划时代发展的时期”^①。闵宗殿、董恺忱先生也把隋唐宋元作为中国古代农业技术发展史的第五阶段，即“南方水田技术发展时期”^②，唐代自然就是此阶段的开端。我们认为：这些学者的看法是合乎历史实际的，因此宋代南方农业的发展，主要是唐代南方农业发展的继续。二者相比，唐代南方农业在技术进步方面成就更大，并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所以，倘若可以把农业生产技术的划时代进步称为“农业革命”的话，那么我国中古时代南方的“农业革命”应当是始于唐而成于宋。

^① 天野元之助：《中国农业史研究》（御茶の水书房1979年增补版）831—832页。

^② 闵宗殿与董恺忱：《关于中国农业技术史上的几个问题》，《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

因此，无论是从中国经济史还是中国农业史的角度来看，唐代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值得我们予以特别的重视。

(二)我国幅员辽阔，各地自然条件与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很早就形成了许多不同的经济区。在封建社会中，由于自然经济的统治，加深了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得各经济区之间的差别更为显著。因此，要正确认识某一时期中国经济的状况，进行区域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唐代以前，黄河中下游平原是我国最主要同时也是最先进的经济区。唐代以后，长江流域起而代之，成为全国经济重心之所在。这一变化，即始于唐代中后期。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原因当然是非常复杂的，但最重要者乃是长江流域生产力发展较快。对于这个生产力提高较为迅速的地区经济进行深入研究，无疑具有重大意义。然而，长江流域地域广大，自身内部也包含着若干不同的经济亚区，这些经济亚区的发展水平，彼此很不一致，甚至悬殊很大。在其中，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自南朝以来一直居于长江流域各经济亚区之首，而从唐代中后期开始，更跃居全国之冠。在尔后上千年的时间内，仍然保持着这种领先地位，直至今日还是如此。鉴于江南地区所具有的这种特殊地位，对于江南经济史进行专门研究，意义就非同寻常。因此，选择这个地区作为研究的地点，确乎是非常典型的。

在这里，我们认为有必要对本书所论的江南地区的确切范围作一简要界说。众所周知，“江南”一词并不是一个有确切范围的地理概念，自古即然，今日更甚。然而，对于一项地区经济史研究来说，合理地划定所研究地区的界线，乃是研究赖以进行的首要任务。在拙著《发展与制约：1368—

1850年间江南生产力经济史研究》第一章第二节《地域界说》中^①，我们曾提出划定一个经济区，主要应根据两个标准：第一，地理上的完整性与内部自然条件的一致性；第二，内部经济联系的紧密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接近。根据这两个标准，我们把“江南”的范围确定为明清的苏、松、常、镇、应天（江宁）、杭、嘉、湖八府及太仓州，即相当于唐代的苏、常、润、湖、杭等浙西五州。在本书中，我们仍坚持上述标准，但在苏、常、润、湖、杭五州之外，再加上浙东越、明二州（即明清的绍兴、宁波二府）^②。增加这两州的理由是：第一，这两州虽与浙西五州因钱塘江相隔而不成为一个地域整体，但其经济重心（即越、明二州北部）的自然条件与浙西五州基本相同，而与这两州所属的浙东地区其他州差别较大；第二，在唐代及以前，这两州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低于浙西五州（可能有些方面还超过后者），在农业发展水平方面亦然；第三，更为重要的是，本书的研究对象仅是农业生产力，而不是整个经济，而在唐代和唐代以前，浙东与浙西各地的农业生产，都还没有形成紧密的市场联系。因此，我们把浙西五州与毗近而且又有许多共同之处的浙东越、明二州合并为一个农业经济区，应当是可以的。经济区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事物，应当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以及不同的研究对象进行划分。因此，本书把润、苏、常、湖、杭、越、明六州作为“江南”的地域内容，并不与拙著《发展与制约：1368—1850年间江南生产力经济史研究》中所作的划分相互抵牾。

① 此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

② 明州原属越州，唐代方析出。

(三)我国自古以农立国，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D.H.珀金斯先生概括说：“在二十世纪以前，农业部门实际上就是中国的整个经济。其他部门不是服务于农业，就是从农业获取原料”^①。我们认为这并不是耸人听闻。事实确实如此。

由于农业在中国古代经济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因此农史研究，应当而且必须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基础。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社会的变迁，历史的演进，归根结底是取决于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状况。而在工业化以前，农业是社会物质生产中的“决定性生产部门”^②。因而，古代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必须从农业发展中去探求。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外学者在唐代农业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这些成果对本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然而，应当指出，在以往的研究中，经济史学家较多注意的是农业中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农史学家则主要致力于对农业技术的探讨。对生产关系进行研究无疑是非常必要的，但是这个研究应当建立在对生产力所作的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因为生产力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而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不仅适用于整个社会生产，而且也适用于农业这个社会生产的基本部门。另外一方面，研究农业技术也非常重要，但技术只是生产力的一个因素，而不是全部。因此，把农业作为社会生产的主要部

^① D.H. Perkin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1368—1968》(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1969), P. 5.

^②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21 169页。恩格斯原话是“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显然，在进入工业化时代以前，这个结论都是可以成立的。

门，从生产力的方面进行深入而全面的研究，尚有待于广大史学工作者进一步努力。本书就是作者对唐代江南农业生产力的研究所作的一个努力尝试。

(四)农业，同一切事物一样，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僵化之物，而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在封建社会中，农业的发展十分缓慢，但不论怎么缓慢，仍然是处在不停地由低级向高级、从落后到先进的运动进程之中。而且，在不同的时期，发展的情况也不一样。有时快些，有时慢些，有时出现跃进，有时甚至发生倒退。因此，对某时某地的农业作静态考察是必要的，但静态考察只有作为动态考察的组成部分才有意义。对某个地区的农业作动态考察，也就是着眼于发展，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该地区在某一时期的农业状况。

根据辩证法的原理，一个事物的发展包含量变与质变两个方面。古代农业的发展通常主要表现为量的扩大（即垦田增加、总产量提高等），但也不排斥在某些时候出现某些质的深化（如技术革新、劳动生产率提高等）。因此，从量与质两个方面来分析问题，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农业发展的基本立场。

总而言之，本书主题的选择与论证，实际上就是希图对典型时间、典型地点的社会基本生产部门——农业——进行动态的历史考察，借此探求我国封建社会生产力的运动状况及其规律。

第二节 本书所用研究方法特点

在研究方法上，本书具有如下三个特点：